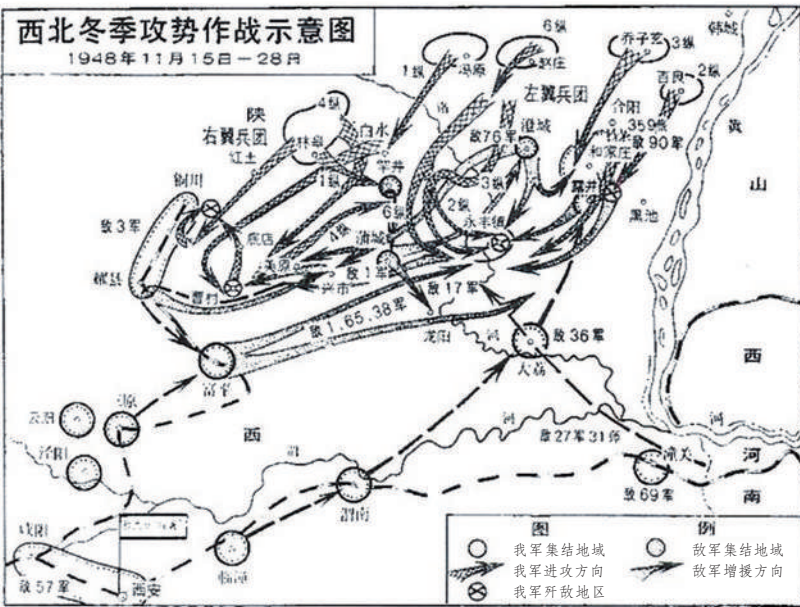


左图:1948年12月,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在陕西省合阳县峪北村召开第二届军民庆祝胜利暨誓师大会。右图:西北冬季攻势作战示意图。



全歼胡宗南部第76军的西北冬季战役

往复调敌少胜多

■姚小锴 王凤春

1948年11月上旬,我西北野战军为配合淮海战役,阻止胡宗南集团调兵增援中原战场,决定在渭北地区发起冬季战役。此役至1948年11月28日10时顺利结束,全歼胡宗南部国民党第76军。战斗中,西北野战军组成左右两个兵团,东西呼应,调动敌人,创造战机,速决歼敌,堪称运动歼灭战的典范。

充分准备积蓄力量。1947年3月至1948年11月,我西北野战军经过一年多的连续作战,接连取得青化砭、羊马河、蟠龙、沙家店、延济、宜川、澄城、荔北等多场大捷,不仅极大削弱了胡宗南部的兵力,也扩大了自身力量。西北野战军从解放战争初期的2.8万人壮大至8万余人,敌我兵力之比也由10:1变为4.2:1。此时敌我兵力对比仍较为悬殊,且西北野战军装备差、弹药缺,后勤补给困难,整体上敌强我弱的态势并未根本转变。另外,我西北野战军为实现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作战目的,每次大的战役几乎都是集中全野战军兵力歼灭敌人一部,而敌军却可轮换与我作战。因此,在每次战役结束后,西北野战军必须调整组织,补充消耗,进行休整和训练。荔北战役后,以彭德怀为书记的野战军前委当即命令主力部队集结于白水、澄城、合阳以北地区,进行为期20多天的整训和补充,主要开展5个方面工作。一是以小股侦察部队对敌实施不间断侦察监视,准确掌握敌情,周密展开战前筹划;二是针对渭北地区多平原

村落攻坚战的特点,加强连续爆破、打坦克、土工作业和迫击炮集中投射炸药等训练,提升部队技术战术水平;三是积极开展“诉苦三查”,教育改造战士,提升部队士气;四是以纵队为单位,各组织300余人的武装工作队,配合地方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,积极袭扰敌人,破坏交通运输线,持续瓦解和疲惫敌军;五是组织群众,紧前筹措和运送粮食、弹药等,做好战前物资准备。

果断调整作战方案。11月6日,西北野战军前委召开军事会议,研究冬季战役的作战部署。彭德怀针对胡宗南集团遭受惨重损失的4个军尚未整补完毕,战场机动兵力大为削弱,仅以3个防御集团分守澄城、合阳、蒲城三点的态势,制订了3套作战方案:一是以一部分兵力突然攻击敌第一线3个集团中的一个,调动另两个集团增援,集中野战军主力在澄城、白水、蒲城之间,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军2-3个师。二是以1至2个纵队包围铜川、耀县之敌,相机歼敌第3军一部,调动敌军主力西援,力争在澄城、白水、蒲城之间歼敌援兵一部。三是以1至2个纵队,攻击耀县、淳化敌军,集中野战军主力围歼铜川敌第3军。经广泛讨论研究,野战军前委决定按照第一方案先歼灭蒲城以北军井、白堤、山东村地区第30师,而后视情确立新的歼击目标,计划各纵队于12日西进,18日开始进攻。11月16日,敌察觉我进攻企图后,将蒲城以北军井、白堤、山东村地区

的敌军撤回蒲城,并将第1军、第65军及第17军12师由蒲城向东机动至澄城地区。敌情发生突然变化,使原定的作战计划不宜继续执行,彭德怀当机立断,决定执行第二方案:将野战军分成左右两个兵团,调动敌人,创造和捕捉战机。

反复调动敌军主力。14日,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在合阳以北攻击敌114师,仅一个半小时就将敌430团全歼。2纵的积极进攻成功迷惑敌人,使敌将主力全部东调。20日,张宗逊副司令员率领的右翼兵团迅速捕捉战机,在西线向铜川、耀县敌军发起攻击,经3天激战,在铜川附近地域歼敌第17师,成功将敌东援主力西调。至25日,敌军主力大部已向西机动至洛河地区,西北野战军左翼兵团当即向永丰镇敌第76军发起攻击,进至西南的敌军又被全部东调前来增援。29日敌增援部队到达永丰、韦庄地区时,我西北野战军早已撤出战斗。此役,敌军被西北野战军牵着鼻子来回转,往返调动,12天在东至洛河、西至咸铜铁路一线往返机动了3趟,平均日行50余公里,几乎没有休息,被拖得疲惫不堪。战后,被俘的敌军将领感慨:“我们的部队不是听胡宗南指挥,而是听彭德怀指挥。”

集中优势速决歼敌。集中优势兵力,各个歼灭敌人,是我军的基本作战原则。11月25日,敌增援部队被西北野战军右翼兵团成功西调后,我左翼兵团原本打算在蒲城、石羊之间地域伏击敌第76军,但敌察觉到我打援企图,便在

洛河东西两岸构筑工事固守,使我伏击计划落空。西北野战军前委发现,敌在被我连续调动后,其整体部署已经松动,兵力也较为分散,尤其是第76军处于相对孤立的位置。前委当即制订围歼第76军的作战计划,坚持围歼与打援并重,以第2、3纵队主力对永丰镇敌第76军实施合围,以第3纵队独立第5旅进至韦庄地区,抗击可能北援的第90军,以第6纵队配合第1、4纵队夹击东援敌军。部队自28日3时发起总攻,战至10时,全歼第76军。

西北冬季战役之所以能实现以少胜多、以弱胜强,全歼胡宗南部第76军,归功于西北野战军前委灵活果敢的指挥艺术和敏锐的战场洞察力。战役打响后,在敌情发生重大变化时,我军当机立断,调整作战方案,始终牢牢把握战场主动权,以左右两个兵团密切配合,往复引诱调动和疲敌敌人,待战机出现后,迅即集中局部优势兵力,围歼孤立之敌。

冬季战役的胜利,完成了拖住胡宗南集团、削弱其有生力量、配合淮海战役的战略目标,粉碎了胡宗南所谓“机动防御”的“新战术”,解决了西北部队的粮食问题,改变了过去持续拉锯的渭北战局,极大加快了西北战场乃至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。

史说新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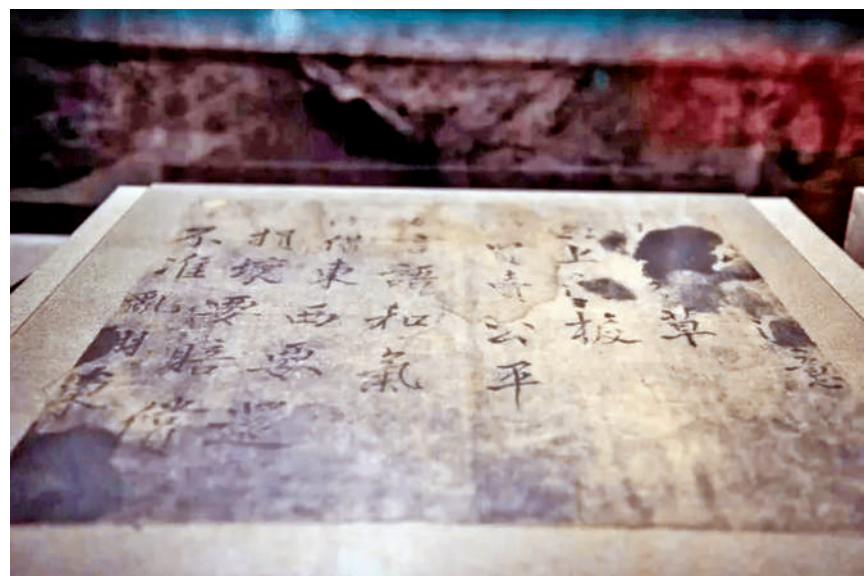
党领导的军队纪律最严明

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的由来及影响

■曹亚铂 曹胜杰

铁的纪律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。毛泽东主席指出,军队要有统一领导和纪律,才能战胜敌人。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,我军就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,依靠高度自觉的纪律,组成坚强的战斗集体,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。

我军在建军之初,就极其重视加强纪律建设,这也是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显著标志。1927年10月,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抵达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。因长途跋涉,饥饿难耐,有些战士刨了群众的红薯充饥。毛泽东知道后,立即召开大会,要求官兵严格遵守群众纪律,并提出了人民军队最早的“三项纪律”(行动听指挥;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;打土豪要归公),后来将“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”改为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”,“打土豪要归公”改为“一切缴获要归公”。1928年,毛泽东又提出了“六项注意”(捆铺草;上门板;买卖公平;言语和气;借东西要还;损坏东西要赔偿;不准乱翻东西),后来又增加了“洗澡避女人”和“不搜俘虏腰包”两项内容,由此形成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的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。1931年9月,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欧阳钦在上海汇报了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的内容,得到当时中共中央的肯定。至此,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成为人民军队纪律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明确遵循。到1947年,由于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实行多年,各地各军内容略有出入,毛泽东专门起草发出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



古田会议纪念馆中写有“六项注意”的红军包袱布

的训令》,对其内容进行统一规定,形成了传承至今的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条文内容。

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教育熏陶下的人民军队,始终保持人民子弟兵的本色,形成了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鱼水之情。红军在长征途中虽然斗争环境极其恶劣,但广大指战员始终严守纪律,对群众秋毫无犯。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后,执行“各民族一律平等”的民族政策。当时世袭羌族土司安登榜正被国民党追捕,当他看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纪律严明,尊重少数民族,同国民党的“汉官”完全不同时,就认定红军是穷苦

人自己的队伍。于是,安登榜毅然率众参加红军,最终牺牲于长征途中。1949年5月,解放军进驻上海后,严格执行党的城市政策和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。为了不惊扰市民,部队在蒙蒙细雨中睡在潮湿的路边。就连当时在上海的国外记者也报道说:中共军队军纪优良,行止有节,虽然有许多大厦是打开着,可以用来做军营,而中共军队仍睡在人行道上。人民军队正是用这样严明的纪律,深深感动了上海市民。

习主席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指出:“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,彰显了革命纪律的伟大力

量。”在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的长期教育熏陶下,人民军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一切行动听指挥、步调一致向前进,革命因此无往而不胜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,相比于国民党军队的“军纪废弛,民怨甚深,失我增援”,红军在党的领导下,依靠统一的意志和严格的协同纪律,在运动、穿插过程中配合默契、以弱胜强,取得几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。抗日战争时期,八路军、新四军严格执行群众纪律,在敌后根据地和人民群众紧密配合,同仇敌愾,一次次粉碎日(伪)军的疯狂扫荡。解放战争时期,相比于国民党军队的“不仅不能爱民,而且处处扰民”,解放军在党中央、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下,深得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,最终以“小米加步枪”打败武器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,以至于蒋介石败逃台湾后也不得不感叹“共产党有纪律,国民党没有纪律”,并将之视为失败的重要原因。

90多年来,在党的坚强领导下,我军始终赓续传承纪律严明、执纪如铁的优良传统,坚守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的行为准则,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。步入新时代,人民军队在强国兴军的伟大征程中,更需要严明的纪律作为保证,更需要传承好发扬好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,树好和平之师、威武之师、文明之师的光辉形象。

链接历史

原典

《百战奇略》畏战篇原文为:凡与敌战,军中有畏怯者,鼓之不进,未闻金先退,须择而杀之,以威其众。若三军之士,人人皆惧,则不可加诛戮,重戡军威。须假之以颜色,示以不畏,祝以利害,喻以不死,则众心自安。法(《司马法·严位第四》)曰:“执戮禁畏,太畏则勿杀戮,示之以颜色,告之以所生。”

畏战篇认为,大凡对敌作战,军中如有畏怯怯战、听到击鼓进军的号令不前进,没有听到鸣金收兵的号令却先行撤退的人,必须选择其中的典型予以斩杀惩戒,以此警示众人。如果全军士卒都惧怕作战,就不能采取杀戮之法,因为这样会严重挫伤士气。此时将帅要以勇武必胜的神色,以示不畏惧敌人,讲清勇敢应战与怯懦畏战之间的利害关系,使部属明白只有敢于战斗才能避免死亡的道理。如此,军心士气才能稳定。恰如兵法所说:“战时需要以杀戮的办法来制止畏怯怯战情绪;但全军普遍存在畏怯怯战情绪之时,则不能单纯依靠杀戮,而应由将帅向部属展现英勇无畏的姿态,并告诉部属勇敢作战方能求生的道理。”

战例

南朝梁敬帝绍泰元年(公元555年),梁将陈蒨被派往长城县(在今浙江省长兴县)构筑防御工事,以防叛军将领杜龛进攻。杜龛乘陈蒨刚到长城且兵力薄弱之际,派兵突袭。梁军将士面对叛军突袭,惊慌失措,陈蒨则保持镇定,指挥军队顶住了叛军的进攻。

1950年3月5日至5月1日,我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第40、43军及琼崖纵队等部队,对退守海南岛的国民党军发起渡海登岛作战。作战过程中,我15兵团指挥员教育引导所属官兵,克服金门战役失利给部队带来的畏战心理,指挥部队成功渡琼州海峡,胜利解放海南岛。

计谋分析

惩戒有度,辩证施策。畏战篇旨在阐述如何处置临战状态下部队畏怯怯战的问题。通常而言,对作战中畏怯不前或临阵脱逃者加以严厉处罚,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惩戒效果,是维护战场纪律并保证作战顺利实施的必要手段。凡事皆有度,严厉惩戒既不等于大开杀戒,也不是解决畏战问题的唯一方法。尤其是在全军普遍存在畏战情绪之时,单纯惩戒容易适得其反,甚至进一步挫伤军心士气。此时应针对军中实际情况,采取其他方法化解畏战情绪。梁军自身兵力仅数百人,面对敌军五千精兵,将士难免产生畏惧心理。对此陈蒨没有简单地采取杀一儆百、以儆效尤的方法,而是通过镇定自若地指挥筹划、周密细致的排兵布阵来稳定军心。海南岛战役发起前,15兵团“自上而下曾经一度产生过较大的思想混乱”“官兵不同程度存在着厌战、怯战情绪”。15兵团为解决这一问题,积极组织部队征集和改造船只,开展乘船、驾船和海上指挥、观察、射击、协同等内容的渡海作战训练,进行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。

注重引导,重振军威。运用畏战之法,重点要处理好严格执行战场纪律和加强部队教育引导之间的关系。既要认识到“执戮禁畏、择而杀之、以戒其众”对制止畏战心理蔓延的必要性,也应认识到“示以不畏、说以利害、喻以不死”对稳定军心、重振士气、激昂斗志的重要性。因此,在严格执行战场纪律的基础上,需着力加强部队

百战奇略

执戮禁畏,太畏则勿杀戮,示之以颜色,告之以所生

陈蒨败杜龛与海南岛战役

■ 许正 徐培仙

思想教育和官兵心理疏导,从而彻底解决畏怯怯战问题。15兵团司令员邓华等指挥员基于金门战役失利的教训,针对官兵中存在的厌战、惧怕大海、对渡海作战缺乏胜利信心等思想问题,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。15兵团在“每批渡海出动前,都做充分的思想发动,开展杀敌立功竞赛活动,激发官兵的荣誉感”,并及时传达练兵中“木船打军舰”及两军先遣奇袭成功的事迹,鼓舞部队士气,帮助官兵克服恐惧心理。正是通过有效的教育引导,15兵团所属部队成功突破敌军海陆立体防线,取得歼敌3.3万余人的重大胜利。

将帅冲锋,率先垂范。用好畏战之法,关键在于将帅。将帅做到“示之以颜色,告之以所生”,在部属面前充分展现出坚决迎敌的勇武精神和沉着应战的从容气度,才能有效化解部属心中的畏怯怯战情绪。在梁军将士“相顾失色”之时,陈蒨不仅“言谈自若”,还能有条不紊地加强防御部署,并亲自上阵御敌。陈蒨的临危不惧、从容不迫,让梁军将士的思想情绪迅速安定下来并全力投入作战。

“将有必死之心,士无贪生之念。”畏战之法告诫指挥员,要以自身的英勇果决、率先垂范,来感召与引领所属官兵不惧牺牲、奋勇抗敌,进而夺取作战胜利。在第四野战军享有“铁将军”美名的第40军军长韩先楚于4月17日亲自带领部队,在海南临高角抢滩登陆。“战士们看到军长冲上来了,战斗情绪倍增,喊杀声震天动地。”



1950年3月6日,我军官兵登船,准备向涠洲岛前进